

祖国力学事业辛勤的耕耘者

—— 恭贺挚友伟长先生九秩华诞

谈镐生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0

今年正值我的老朋友钱伟长先生九十华诞, 我愿在此向他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祝愿他健康长寿、老当益壮、诸事顺遂!

我与伟长先生的相识、相知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1946年初我赴美留学, 2月间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研究室(JPL), 那时在Th. von Karman教授周围可谓人才济济, 特别是集中着几位出类拔萃的中国青年学者: 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等等, 我很快就与他们熟悉了。青年钱伟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当年风华正茂, 那双大眼睛不时闪着智慧的光芒, 其时已经在弹性板壳理论、柱壳扭转理论及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我们不久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除了切磋学问之外, 我们也经常议论国内外大事, 我折服于他那种直言不讳的性格。我认识他以后几个月, 在一次促膝长谈中, 他悄悄地告诉我, 他想回国效力, 我当时确实有点惊讶, 因为他当时已在JPL有了相当稳固的职位, 收入不菲, 而且Th. von Karman教授相当赏识他, 回国就意味着丧失已取得的优裕地位。但他立意已决, 明确表示不愿意继续“为他人做嫁衣裳”。他对我说: “现今国内力学界杰出的人才较少, 而富国强民又离不开力学。我回去正好可以开拓祖国的力学事业, 乃至航空事业。”于是, 他以回国探亲为名, 取得了von Karman的同情, 又制造了请假短期回国的种种假象, 毅然决然回到了祖国。现在想来, 当时的青年钱伟长的确表现了巨大的爱国热情, 以后的事实也表明, 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此后, 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 我与伟长先生断了音信, 直到1965年我回到国内, 但是, 那时钱伟长教授还在逆境之中, 我们无法尽情畅谈, 我只能在我的良师益友郭永怀教授那里获得关于他一鳞半爪的消息, 得知他没有放弃科研、教学工作, 还继续在为郭先生任主编的《力学学报》审稿, 他的毅力使我深受感动。此后不久, “文革”开始了, 我和他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更谈不上互通音问了。可是, 我仍关心着这位老朋友的处境, 那时关于钱伟长的“小道消息”特别多, 弄得我真假难辨, 直到1972年, 在报上读到伟长兄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欧美, 我为他松了一口气, 心想他一定有贵人相助, 而这位贵人非敬爱的周总理莫属, 后来, 我的这个猜测得到了证实。

我与他的欢乐重逢大约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岁月悠悠, 一晃过去了32年, 真是弹指一挥间, 我俩都从挥斥方遒的青年变成了华发从生的花甲老人了, 我们不禁热泪盈眶。我觉得, 经过多年的磨难, 他似乎禀性未改, 依然纵论时政、畅所欲言。他当时显得很兴奋, 对我说, 他要把损失掉的时间补回来。以后这些年他的确这样做了。

此后, 我们进行了多次长谈, 谈论得最多的是如何推动我国力学事业的发展。我认为, 力学从其本质来说, 更多的是一门基础科学, 因此我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创办了基础力学研究室, 集中了一批优秀青年合力攻坚。伟长兄完全赞同我的观点, 他也认为, 把力学当作纯粹的工程学科是荒唐的, 力学既是技术科学, 更是基础科学, 必须从基础抓起。当时他着手创建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后来扩大为专业委员会), 并邀约我参加。我正好对理性力学和应用数学感兴趣, 我俩志趣相投, 于是一拍即合, 由他当专业组的第一任组长, 我当副组长。专业组用了这样长的名字当时颇费了一些思量, 我们觉得那时国

内的应用数学界更推崇“可应用的数学”，陷在数学中，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哥廷根学派的应用数学，即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的应用数学，因此，我们决定用“力学中的数学方法”这个名字，乃至一直沿用至今。专业组一成立，马上着手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例如兰州的理性力学研讨班、上海的奇异摄动理论研讨会、合肥的非线性波学术会议、无锡的非线性力学学术会议、武汉的分岔、突变和非线性稳定性会议等等，从1986年开始，干脆开成了现代数学和力学系列会议(MMM系列会议)。在此期间，只要健康允许，我总是兴致勃勃地参加他组织的学术会议，而他更是每会必到。我欣慰地看到，岁月没有消磨了他的锐气，他仍然如此精神饱满、机敏睿智，对许多学术问题有他独到的见解。

1983年，年过古稀的伟长先生立意组织第一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而且想把它开成高级别、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我真叹服他的魄力。会议刚开始筹备，伟长就提出由我来担任会议指导委员会副主席(他本人任主席)。他对他的助手说：“当今力学界老科学家中数理基础最扎实的应该是谈镐生先生，一定要请他‘出山’。”既然老朋友慧眼相识，我当然欣然领命了，我积极提供线索，邀约了不少国际力学界的知名人士与会。经过两年的紧张筹备，1985年10月，会议在上海胜利召开，许多国内外力学界的顶尖人物纷纷前来，院士就来了十几位。会议空前成功，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同志也前来致贺。从中，我也领略了钱伟长这位老朋友的非凡的组织能力。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以后又开了三届，我始终担任会议的指导委员会副主席，但由于健康的原因，仅参加了1993年在北京举行的那一届。看到会议的盛大场面，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觉得在钱伟长和他的师友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真的把我国的力学事业推动起来了。我在这当中也尽了绵薄之力，也深感欣慰。

1991年，应甘肃省领导之邀，我与伟长先生一起参加了全国政协的一个代表团访问甘肃，我与他得以有较长时间的朝夕相处。当时他已年近八旬，我也早过了古稀之年。我们两个依旧无话不谈，他最关心的还是力学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对我国西部发展中的力学问题十分关心，认为力学工作者在改变西部环境(如治理沙漠、开发水利、改善气候等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我也有类似的想法，在谈话中我们经常发出会心的笑声。

作为挚友，我与伟长之间总是彼此敬重，赏识对方的学问、人品。几十年了，我们从来没有过意见相左的时候，而且在很多方面，有着完全相同的见解。使我钦佩的是，他一直怀着爱国报国的拳拳之心，无论处于逆境，还是处于顺境，时时刻刻把党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为之不遗余力地进行实践，不愧为我国现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我为有这样的挚友而感到骄傲。